

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看延安时期的政治民主

周裕杰

延安大学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陕西延安, 716000;

摘要: 党中央在延安大力推动民主建设, 发展了基层民主, 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延安民主并非一个简单的自由解放叙事, 而是一个充满张力、解放与规训并存的复杂权力关系重组过程。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出发, 从微观权力分析与话语实践分析两个维度切入, 考察了“三三制”、选举运动、整风运动、诉苦会、劳动模范塑造等具体实践。这些实践一方面通过广泛动员和赋权, 使权力在网络化渗透中流动; 另一方面, 权力又通过“真理政权”的建立、话语的禁律程序、身体的规训和媒介的收编等微观机制, 对个体和集体进行着精密的引导与塑造, 将多元声音纳入一元化的革命话语轨道, 重构了新的权力秩序。通过这一视角去分析延安时期的政治民主并归纳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 福柯; 权力; 话语; 政治民主

DOI: 10.69979/3029-2700.26.01.052

1 福柯的权力观

福柯强调权力的去中心化, 认为权力是没有中心的, 多元的, 分散的, 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 比如学校、医院、监狱等机构。权力不仅是压迫性的, 还具有生产性, 比如规训 (discipline) 权力塑造了人的行为。福柯认为权力是通过话语来表现的, 人与人之间的话语, 无论是何种职业, 无论话语的内容是什么, 彼此之间的话语都是权力存在的载体。“‘话语’的基本含义就看做是展现秩序的符号系统。换言之, 秩序是话语的产生的依据, 符号系统是话语的外在表现”^[1]。

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 权力通过话语来表达和实现自身。在社会中某一领域中具有更大权力的人往往其话语就更具主导地位, 其权力又来自于自身话语的构建。权力因而塑造了话语的内容和规则, 权力不仅决定了谁有话语权, 还影响着话语的内容和传播方式。处于权力中心的群体或个体, 往往能够制定话语的规则和标准, 决定哪些话题是重要的、值得讨论的, 哪些观点是被认可的、合法的。其他不处于权力中心的人则在这个话语模式下形成自己的话语。话语具有建构权力的作用, 话语并非仅仅是权力的被动反映, 它还具有积极建构权力的能力。通过对话语的运用和传播, 新的权力关系可以被创造出来。

2 微观权力分析

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强调权力并非仅存在于宏观政治结构中, 而是通过日常实践、知识生产、身体规训

等微观机制渗透于社会各个角落。延安时期的政治民主实践 (1935-1948) 在统一战线抗日的话语下以“民主”为旗帜, “对于抗日任务, 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 为民主即是为抗日……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2]其具体运作中隐含了微观权力逻辑。

延安时期的群众参与“三三制”民主政权、选举运动、生产运动体现了福柯所言的“权力微观物理学”。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 保证了人民享有话语的权力, 从宏大的抗日政策到具体的乡镇工作安排, 不再是任务下派到完成的单向度实行, 而是民主讨论后的集中执行“三三制”政权表面上是多阶级联合 (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 实则通过“民主集中制”将非党人士纳入革命话语轨道。权力并非自上而下单向支配, 而是通过分散的实践渗透到社会毛细血管中。群众通过参与基层选举、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等, 既通过话语的表达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又是被规训的对象。

在党的领导自上而下开展的民主以外, 微观的权力话语也得到了展现。群众路线强调干部与群众的直接互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成立了中央调查研究局和各类调查团, 党员干部深入基层, 联系群众进行系统的调查。基层村政权在抗战前多由地主阶级把控, 如太行区赞皇县黄北坪村长期被侯、王两姓地主统治, 村民缺乏自主权。^[3]通过八路军和抗日政府的介入, 发动群众开展反贪污、反浪费斗争, 逐步建立以

贫雇农为核心的民主政权。张闻天领导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在晋西北兴县黑峪口村发现，当地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和公民小组会议的形式，让农民直接参与村务决策。中央妇委组织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在《沙滩坪调查》中提出，妇女通过参与生产合作社和识字班，逐渐获得经济独立与政治话语权。边区政府据此制定政策，鼓励妇女参与村政权选举，推动性别平等的民主实践。

尤为重要的是，延安时期的权力实践远非简单的“控制”，其深刻体现了福柯所言权力的“生产性”。它成功地生产出了符合革命需要的“新人”如“劳动英雄”、“觉悟了的农民”，生产出了同志式的平等与军民鱼水情这样全新的社会关系，更生产出了一套全新的知识体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生产性超越了传统的压迫性权力观，揭示了权力如何积极塑造主体和创造现实。

3 话语实践分析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强调话语不仅是语言表达，更是一种权力运作的实践形式。话语通过“排斥程序”构建知识体系，并渗透于社会关系的毛细血管中，既生产主体又规训主体。延安时期的政治民主实践，正是通过革命话语的建构与传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权力关系网络。“到了1941年，无论国内外还是党内外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党内整风成为必须实施的历史任务。”^[4]延安整风运动通过《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文本，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为唯一合法话语体系。这一过程符合福柯所言“真理政权”的构建逻辑：通过划分“正确思想”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边界，排斥自由主义、封建伦理等异质话语，形成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真理标准，实事求是从而成为全党的话语禁律。全党以及广大民众都在这个话语逻辑下表达自己的话语。在这一时期，阶级话语出现了符号化的特点，话语是秩序通过符号的表达，阶级话语因而表达了其阶级秩序。在阶级话语的影响下导致了社会身份的重构，原先各种成分的身份转而增加了阶级意义。延安时期通过“人民”“敌人”“翻身”等术语的反复使用，构建了二元对立的话语框架。这些术语在不同时期的内涵也不尽相同，与“敌人”相对立的“人民”在延安时期的范围“是个广义的概念，基本等同于‘国民’，它与中共领导下的‘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所组成的‘人民’有着本质的区别。”^[5]以诉苦会为例，

农民的个人苦难被转化为阶级压迫的集体话语，个体的情感经验被纳入革命的话语体系。这种符号化操作符合福柯对政治术语建构的分析：语言不仅是描述工具，更是划分权力边界、重塑主体认同的装置。个体的民主经过权力话语的能动作用转变为集体的民主话语。

这一时期的媒介技术不单承担了传递话语的功能，也形成其规训功能，《解放日报》通过典型报道吴满有“劳动英雄”形象的塑造革命模范，将个体行为纳入集体规训框架。这就用权力话语要求边区的每个个体的话语的范围，既对劳动英雄的崇拜进而影响自身的行为规范。同时，墙报、秧歌剧等民间媒介被收编为革命宣传工具，墙报的辐射范围几乎到所有边区人民，因而话语的表达也更朴实和简约，其中群众的政治参与也被扩大，这些民间媒介成为了群众行使民主权力的重要手段。同时，这些话语的表达也不能超过党的集中话语，在价值观和策略方面要与党的话语保持一致。这既赋予群众表达空间，又通过内容审查确保话语的“正确性”，体现了权力“既压抑又生产”的双重性。墙报、民间戏曲等本属草根文化的话语形式被革命收编后，既扩大了意识形态传播范围，也导致民间话语的“去地方化”，被赋予了革命的民主话语。

秧歌、标语书写、集体劳动等实践将革命意识形态嵌入身体记忆。例如，秧歌舞的整齐动作和集体队列，通过身体协调性训练强化“纪律性”与“集体主义”意识，印证了福柯对“规训权力通过身体操控实现治理”的论述，其规训话语通过群众的身体，影响其自身的话语表达。

4 权力的规训与控制

“规训性权力是对人的肉体、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纵的权力技术通过诸如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等手段来训练个人，制造出只能按照一定的规范去行动的驯服的肉体。”^[6]而话语不仅是表达，更是权力运作的载体，通过真理政权的确立来排斥异己，构建知识体系。因而延安时期群众和知识分子的话语是在“抗战高于一切”“整风运动”等真理性话语的体系下形成的，是集体话语对个体话语的规训，进而影响控制了个体的行为规范。福柯认为，权力不是被某人或一部分人占有的，而是被行使的。延安时期的政治民主实践通过去中心化的权力网络重构了传统威权模式，墙报、秧歌剧等民间媒介被允许表达群众诉求，在话语禁律的范围

内可以对干部官僚主义的批评，打破了传统士绅对文化话语的垄断。权力通过规范化和真理生产实现控制”，延安民主通过劳动模范、诉苦叙事和集中决策等机制，将革命意识形态转化为日常生活的自然化规范。

农民在诉苦会中既是“苦难的讲述者”，传达个体的话语，又是“阶级话语的传声筒”，传达阶级的话语：“毛泽东在建构和传播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过程中，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强调真正的知识是联系实际的理论，而不是书本中的字句和教条。因此，工农等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体才是有知识的，知识分子却名不副实。”^[7]

延安民主的双重性并非对立，而是解放和规训并存，一方面通过阶级参与、话语赋权瓦解传统威权，呼应了福柯“权力在关系中流动”的论断；另一方面借助身体规训、真理政权和制度设计，构建了更隐蔽的权力网络，印证“权力通过自由扩展自身”。

5 结语

“福柯理解的权力并非只是消极的否定性力量，而是一种生产性的、建构性的因素，权力的运作和建构产生出新的存在关系和存在方式。”^[8]延安时期的参议会制度、生产运动与文教革新，通过赋予民众话语权与决策参与权，打破了传统权力对真理的垄断，将民主协商嵌入基层治理，使民主成为打破封建压迫的话语实践。而生产动员大会以“自己动手”等口号的号召，给予经济自给与民生的话语政治赋权，通过劳动规训重构了“身体—权力—话语”的互动，使个体在集体实践中获得主体性觉醒。尤为重要，延安的文艺大众化将文化话语从精英垄断转向人民本位，呼应了福柯所言“权力通过知识塑造主体”的辩证逻辑。

本文运用福柯的微观权力视角，并非要否定或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宏观阶级分析。恰恰相反，福柯的理论提

供了一个有益的补充，它揭示了在代表先进阶级的政党领导下的、具有历史进步性的革命实践中，权力的运作机制是复杂且多面的，解放与规训往往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存于社会实践的毛细血管之中。

但不同于福柯对规训权力的悲观批判，延安的经验表明，当话语权真正由人民掌握时，规训可转化为自我教育进而集体解放的路径。这种历史实践不仅证明了民主政治的生命力在于权力关系的动态平衡与人民主体性的激活，更为当代破解现代性权力困局提供了启示：唯有将民主嵌入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通过制度保障与文化赋权使民众成为话语的创造者与权力的共治者，才能抵御资本与官僚化对民主的侵蚀，实现福柯所期许的“生存美学”与政治解放的统一。

参考文献

- [1] 郇喜. 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权力观与福柯微观权力思想比较研究[D]. 沈阳师范大学, 2014, 14.
-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M]: 256, 275.
- [3] 马维强 史灿. 调查研究是党领导根据地建设的法宝[J]. 历史评论, 2024 年, 第 6 期: 98.
- [4] 荣敬本. 《论延安的民主模式》[M]. 陕西: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8 月.
- [5] 吴永. 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人民”话语的建构及其意义[J]. 中共党史研究, 2009, (02): 71-79.
- [6] 陈炳辉. 福柯的权力观[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04): 84-90.
- [7] 李永进.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研究[D]. 清华大学, 2017. 185.
- [8] 罗骞. 所有的力量关系都是权力关系: 论福柯的权力概念[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5, 29(02): 65.